



文物三字经

主编：中国文物报



辽宁教育出版社

前言

“文物三字经”历经三年的策划、撰稿、讨论、修改、注释、编辑工作，现已正式付梓，预计将伴随着兔年盛开的春花，奉献给渴望已久的广大读者。但愿她以自己独有的风姿、特色，立足于文物展示园地，散发芳馨，放射异彩，成为人们喜爱的一束新葩。

“三字经”历来都被视为启蒙读物，属于“下里巴人”之列。以此作为文物宣传作品，似乎难免有失其严肃、高雅文化身份之嫌。然而，普及文物知识，变高雅为通俗，开创曲高和众的新路，是许多文物工作者长期思考而未能取得突破的重要课题。编写文物三字经，自然也就成为对这一课题的思考和探索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参与编写工作的专家、学者，都不惜小题大作，以满腔的热情投入这个“雕虫小技”之作，都希望以此作为对文物宣传工作的一份新贡献，因而编写工作进展顺利，印刷出版部门也给予热情支持，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目的，这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

通俗易懂，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便于记诵的启蒙读物，源远流长，常盛不衰，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等，曾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直至今日，仍不失为可读的有益之卷。其文字之精，形式之美，更为今人所借鉴、因袭。正是由于这种形式符合国情民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所以许多“旧瓶装新酒”的宣传普及读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又重新崛起，再露锋芒。广东、北京等地近年来推出的《新三字经》，在社会各界一炮打响，受到好评，充分表明旧瓶确实可以装新酒，传统的好形式依旧可以为当今所用。《文物三字经》的问世，正是在这些古今的成功经验的启发和鼓舞下，为开创文物宣传展示新形式而进行的一次尝试。成功与否，自然只能由实践来检验，由读者来评说。

历史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积累，文物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见证，文物的保存与流传，是人类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的必需。人民既能创造历史，同样也就能保护历史。只要人民群众参与并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文物传之后世，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但是，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活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多数曾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当他们不曾认识保护文物的必要性的时候，加强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宣传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他们提高参与文物保护的自觉性，真正认识到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保护祖先，保护家园，保护自身。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固然要特别重视法制的内容，使他们懂得保护文物光荣，破坏文物有罪。但也绝不能忽视文物知识的宣传。普及文物知识，帮助人们认识文物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所在，乃是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法制只能引导他们“知其然”，知识才能使他们

“知其所以然”；法制是准绳，能够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知识是力量，能够保证行为的自觉和持久。只有两者兼备，才能展翅齐飞。普及文物知识的难度，还在于文物作为历史遗存，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大量文物专业图书，都给人神秘、深奥、枯燥之感，往往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要改变这个现实，使文物图书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非大胆探索、创新不可。《文物三字经》，正是在这个理念的驱动下，为加大普及文物知识的力度而努力创作成功的一种试行读物。我们坚信，“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在新世纪的文物宣传园地里，一定会有更多、更美的新花、硕果，多方位、多层次地满足普及文物知识的需求。

《文物三字经》在出版之前，曾经作为“征求意见稿”和“修订稿”先后在文物报刊上发表。两年多来，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许多读者要求编印成书，以便于携带和查阅。为此，我们又详加注释，配置图片，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彩印出版。全书由六十六条、一千九百八十字的正文，二万余字的注释和二百六十余幅图片构成，其宗旨，以物见史，以史育人；其结构，以史序为经，以实物为纬；其规模，为古今文物通俗读物所仅有；其内容，涵盖中华古国全部历史进程；其形式，适应现代图书出版新潮；其特色，图文并茂，自然流畅，雅俗共赏。在这个方尺之卷里，可以按图索骥，纵览历史长河之浩渺，横观历朝历代之辉煌，品察各乡各地之精粹，颇有囊括四海，包罗万象，兼融天下之势。然而，它毕竟是普及知识的初级课本和学习历史的参考读物，只能帮助一般文物工作者、文物爱好者和广大青少年朋友了解中国历史及其实物遗存的脉络和概貌，满足认识历史，了解国情，增强文物意识的基本要求。而对于那些立志于文物研究的人们，无疑只有乘专业著作之舟，才能航行于学问之海。

这个作品的出台，是反复推敲、锤炼的结果，是个人创作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孙机、杨泓两位老搭档作为全书主笔所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这两位教授所具有的才识也是人所共知的。他们以对宣传祖国文物的高度责任感承担这个“下里巴人”之作的撰稿任务，从正文到注释以及版面设计等等都注入了大量心血，表现了“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可贵精神。其它参与者，也都是文物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以保护祖国文物为己任，毕生为之奋争不息。在编写、讨论过程中，他们严肃认真，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为此书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策划助理王莉同志的劳动也是辛苦的，实际所承担的是全书图文的组编任务，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中国文物报作为主编单位，理所当然地衷心感激他们为此书所作出的贡献。出版之后，如若获得更多读者的肯定和青睐，则将是所有参与者的莫大的欣慰和鼓舞。

彭卿雲

一九九八年隆冬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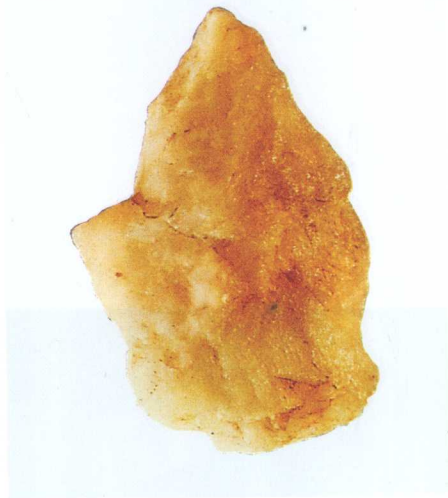
我中华，立东方。民族多，幅员广。文明早，
历史长。古文物，更辉煌。全世界，皆景仰。

天安门广场夜景(陈禹摄)





周口店，鸽子堂。猿人洞，篝火旺^①。结群居，斗虎狼。打石斧，辟洪荒^②。地层深，多宝藏^③



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尖状器

周口店龙骨山猿人洞(罗哲文摄)

①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以西的龙骨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化石出土地点，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1地点是其中最重要的遗址，原是一个很大的山洞，名鸽子堂。东西长约140米，

南北最宽处约20米。这里不但出土了猿人化石，还有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以及用火的遗迹，灰烬最厚处达6米，表明北京猿人不仅懂得用火，还有保存火种的能力。在世界古人类遗址所发现的用火痕迹中，这里是



北京猿人用火示意图(罗哲文摄)



北京猿人用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头

最明确的一处。

②北京猿人已知使用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刃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器型。他们用这些工具与严峻的大自然作斗争,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③周口店猿人遗址地层中包含的人类化石、石器、骨器、用火遗迹及各种哺乳类动物化石都具有重要价值,是珍贵的科学资料。

新石器，磨制光^①。烧陶器^②，作衣裳^③。建房屋^④，
牧牛羊^⑤。造骨耜，种稻粱^⑥。塑女神，求丰穰^⑦。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鹤鱼石斧图陶缸

①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重大的技术成就。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尚继续使用打制石器，但磨制石器逐渐得到推广。新石器时代晚期又发现了钻孔技术，使石器便于装柄，使用时更加有效。

②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比较原始，陶土未经淘洗，多为手制，烧成的温度低，故陶质疏松，器形也比较简单。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出现了较精致的陶器，并在制胚的粘土中添加羼合料如砂粒、稻壳、贝壳末等，增强了陶器的使用性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开始以转动较慢的陶轮修整器口。后来轮制成为拉胚成型的主要方法，陶器的形状也就愈加规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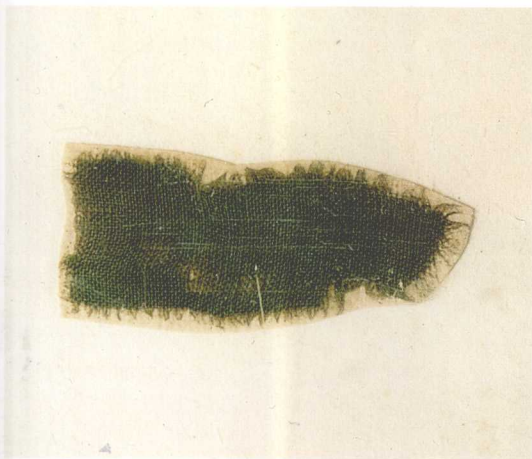
③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能用兽皮

御寒。到了新石器时代，以大麻、苧麻、蚕丝、葛、毛等为原料的织物均已出现。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百多件带有麻布的印痕，估计是大麻织物。浙江余姚河姆渡曾出土苧麻织物残片。浙江吴兴钱山漾曾出土丝织物残片，有绢片和丝带等。在新疆五堡和青海柴达木盆地南部还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羊毛织物。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骨针为数更多。说明这时的人们已能用织物缝制衣服。

④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多“穴居而野处”，新石器时代则能建筑房屋。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方形和圆形两种房子。方形房子多为半地下式，圆形的房子则直接建在地面上。墙壁用细木柱和枝条编结而成。房内地



河姆渡文化骨耜



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丝织物残片



红山文化泥塑女神像(罗哲文摄)

上挖有浅坑作火塘,供炊煮和取暖之用。黄河下游龙山文化遗址中的房子更为密集,室内多用石灰质筑成白灰面。长江下游地势低洼和地下水较高的地区,还出现了将下部架空的干栏式建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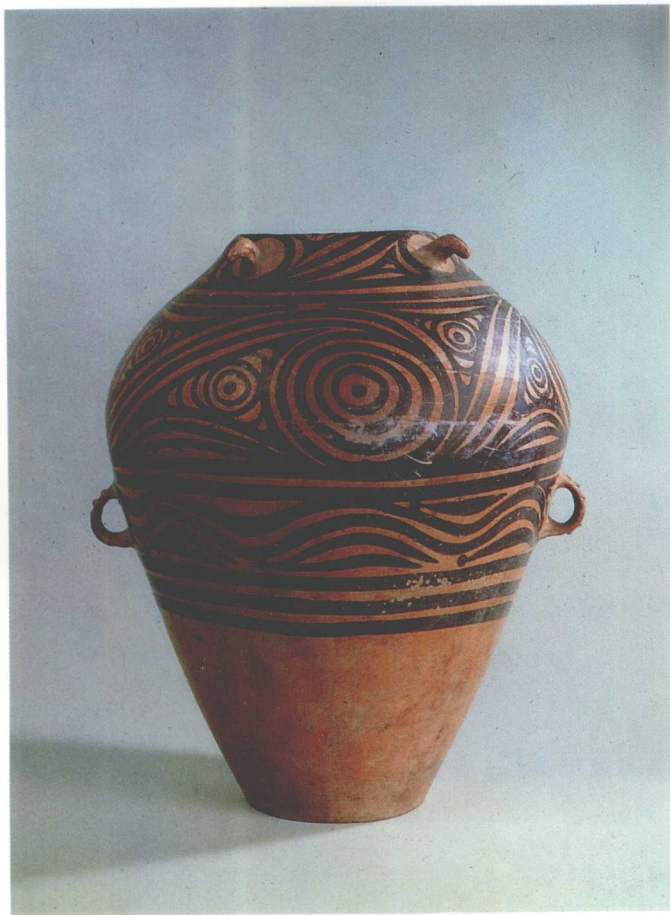
⑤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中都发现家猪、狗和鸡的遗骸。仰韶文化遗址中除上述三种家畜家禽的遗骨外,还增加了黄牛。龙山文化遗址中,更增加了水牛、马、山羊和绵羊。通常说的“六畜”,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均已被饲养了。

⑥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成批的骨耜,是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而成,肩白处横凿方孔,在耜冠正面中部挖竖槽并于其两侧各凿一孔,以便安装木

柄。当时本地已种水稻,曾发现大量水稻遗存,稻谷、稻壳、稻叶混杂在一起的堆积层厚0.2—0.5米,最厚处达1米。骨耜就是在稻作中用以修滕筑堰、排水灌水的农具。可以看出,在原始的火耕之后,我国南方已发展起耜耕农业。

⑦在辽宁省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女神庙遗址,其中出土的女神塑像,有的大小与真人相近,有的为真人的2—3倍。还发现了一件完整的女神头像,双目嵌以玉片,炯炯有神。它们都是当时用以祈求丰收的神像。

有彩陶^①，有黑陶^②。造型美，纹饰巧。绘舞人，描花草^③。画虫鱼，刻符号^④。蛋壳陶，最精好^⑤。



大汶口文化彩陶钵形鼎

马家窑文化彩陶四系罐

①距今约八千年，泾、渭流域一带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中已出现彩陶。仰韶文化兴起后，彩陶的制作更加发达。河南、陕西、山西相邻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以富有动感的弧形构成流畅的图案。黄河下游地区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中的彩陶也兴盛起来，其编织纹和多角星纹极具特色。长江流域的大溪、马家浜、青莲岗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有彩陶。

我国西北甘、青等省的新石器文化因受自然条件和交通等因素的制约，社会发展较

缓慢，彩陶工艺在这一地区延续的时间较长，这里的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呈现出独特的繁荣景象。

②我国新石器时代中黑陶也广泛见于南北各地。在南方，河姆渡文化中已出现夹炭黑陶，烧成温度不高。继起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也有黑陶，但大部分是灰胎黑衣陶。在北方，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早期以灰陶为主，晚期多为黑陶。但以山东龙山文化中出土的泥质黑陶最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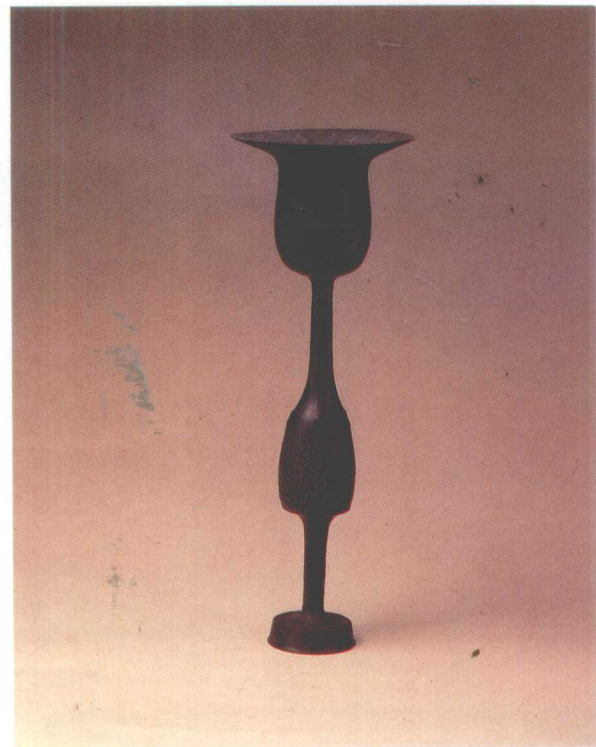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盆



大汶口文化彩陶钵

③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所出彩陶盆绘有舞蹈纹，生动地反映出先民手拉手唱歌跳舞的形象。仰韶文化彩陶上以圆点、勾叶、弧线三角纹等组成的带状花纹，一般被认为是代表植物的花和叶子。

④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共发现 270 多件标本有刻划的符号，简繁不一，可归并为 50 多种。它们可能是与制陶有关的特殊记号，但具有向图画文字过渡的性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足杯

质，是文字的前身。

⑤山东龙山文化中的细泥薄壁磨光黑陶的制作水平很高，这种陶器的陶土经过淘洗，然后以轮制法成型，器形仅见杯的一种。胎壁的厚度为 0.5—1 毫米左右，烧成温度约 1000 摄氏度。更由于陶窑结构的改进和密封法的采用，陶器在烧制过程中熏烟渗碳，成品漆黑光亮，造型优美，体形匀称，厚薄均等，十分精巧，胶县三里河出土的一件，通高 20 厘米，而重量却不到 40 克。称之为蛋壳陶绝非夸大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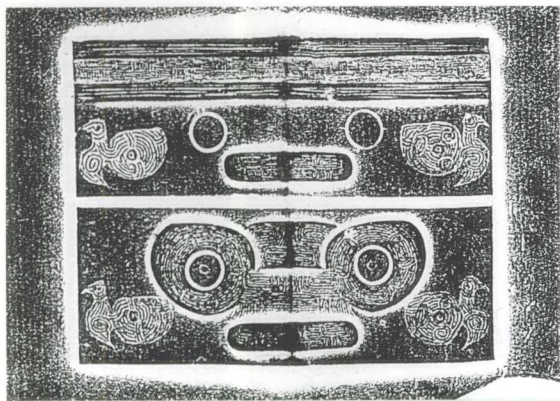
南良渚，能琢玉^①。有玉琮，有玉璧^②。缫蚕丝，
制漆器^③。台湾岛，一脉继。大垵坑，鹅銮鼻^④。



良渚文化神面双鸟纹玉琮



良渚文化神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神面双鸟纹玉琮纹饰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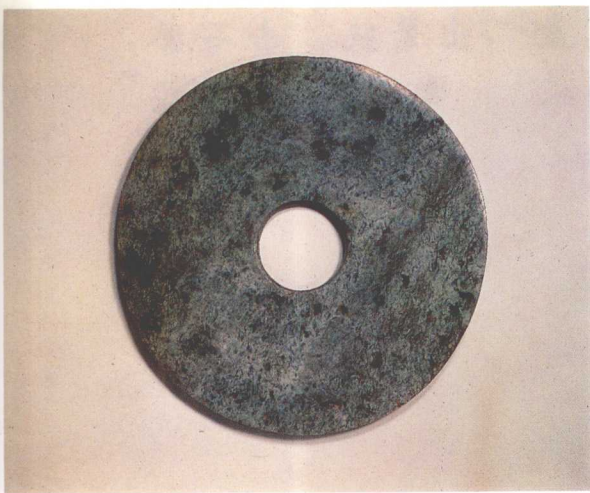
①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这里的玉器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极为突出。江苏武进寺墩发现的一座良渚大墓，随葬玉器达 57 件，被称为“玉敛葬”，这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

②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玉琮、玉璧的数量较多。琮为内圆外方的筒状玉器，有节，分单节和多节，常饰以弦纹和神面纹。璧为扁圆形，中有小圆孔。琮和璧起初为装饰品，后来都变成礼仪用具。武进寺墩出土的大玉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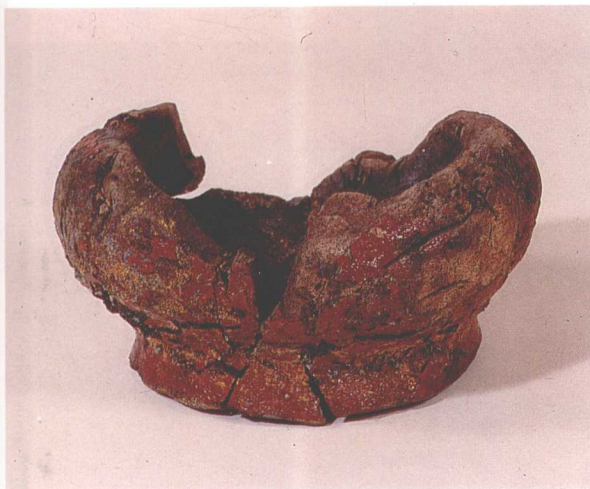
高达 23 厘米，吴县草鞋山出土的大玉璧直径达 21 厘米，均为良渚玉器中的精品。

③漆器起源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中，已发现用朱色漆涂饰的木碗。在良渚文化遗址还出土了陶胎漆器，江苏吴江梅埭发现的一件陶胎束腰小壶，先涂一层稀薄的棕色漆，再用金黄、棕红两色厚漆加绘两组绞丝纹图案，器壁光滑绚丽，美观而且实用。

④考古材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良渚文化大玉璧



河姆渡文化漆碗



台湾圆山遗址出土人兽形玉饰

台湾海峡两岸的原始民族部落就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以台湾省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出土物为代表而命名的大坌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分布很广,其绳纹、划纹粗砂陶器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东兴贝丘、广东潮安陈桥等地出土的文化遗物相似,说明大坌坑文化正是中国东南海岸(包括福建、台湾、广东的海岸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一环。

大坌坑文化之后,在台湾西海岸兴起的

是凤鼻头文化,在属于此文化的屏东县鹅銮鼻遗址中出土石棺群,遗骸上发现拔牙习俗。这种习俗最先发生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盛行于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一带。以后向西南传到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中,向南传到长江下游的马家浜和良渚文化中。可能在不晚于早商时,这一习俗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反映出两岸居民在极其悠古的时代中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陶寺，有大墓^①。出龙盘^②，出鼉鼓。击石磬，
配乐舞^③。持玉钺，兴军旅^④。古国家，正崛起^⑤。



陶寺文化彩绘龙纹陶盘

①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发现了规模很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址、陶窑和墓地。其中的大墓长3米上下，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达一、二百件。应是氏族领袖的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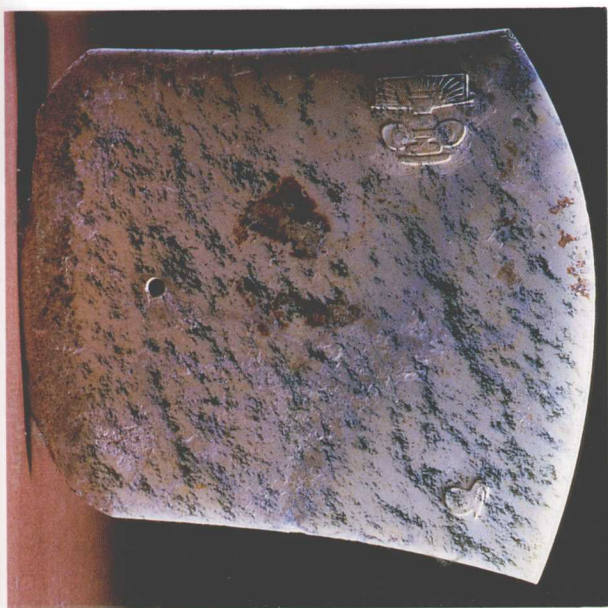
②陶寺大墓中出土的彩绘陶盘，造型厚重，一条雄硕的龙纹旋绕在盘中。这是迄今

在中原地区见到的最早的蟠龙图像。此盘应不同于一般日用品，而是一件礼器。

③陶寺大墓中的鼓均以两件为一对，与一件大石磬伴出。鼓胴呈直筒形，高度近1米，用树干挖制而成，外施彩绘。由散落在鼓腔中的鳄鱼骨板得知，当初是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所称“鼉鼓”。石磬用石灰岩



陶寺文化石磬



良渚文化神面纹玉钺



陶寺文化异形陶器

打制，长80—90厘米。上端对钻一孔，以备悬挂。鼓磬相和，演奏的应是带有礼仪性质的音乐。

④陶寺大墓中出土用褐绿色玉琢制的钺，当非实战用品。只有掌握军事指挥权的部落首领人物，才能用它作为自己的仪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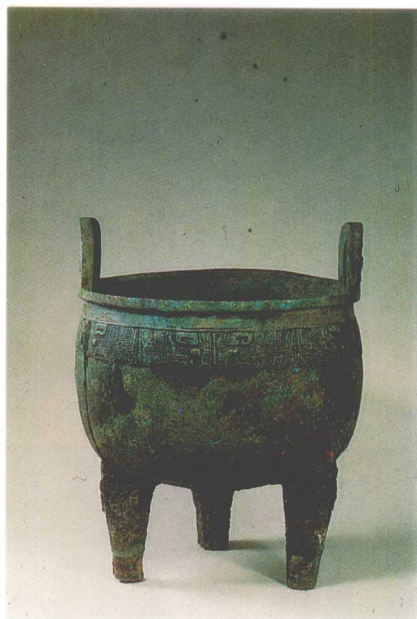
⑤在陶寺墓地中，百分之九十是没有木

葬具和随葬品的小墓，大墓只占墓葬总数的百分之一弱。反映出社会财富已被聚敛到少数部落贵族手中。鉴于陶寺遗址已出土金属器、礼乐器、仪仗品等情况，这里的部落已处于产生国家的前夜。

大邑商，奠安阳。迁王都，洹水旁^①，铸铜器，
世无双。后母戊，鼎中王^②。用人殉，太凄怆^③。



商·后母戊大铜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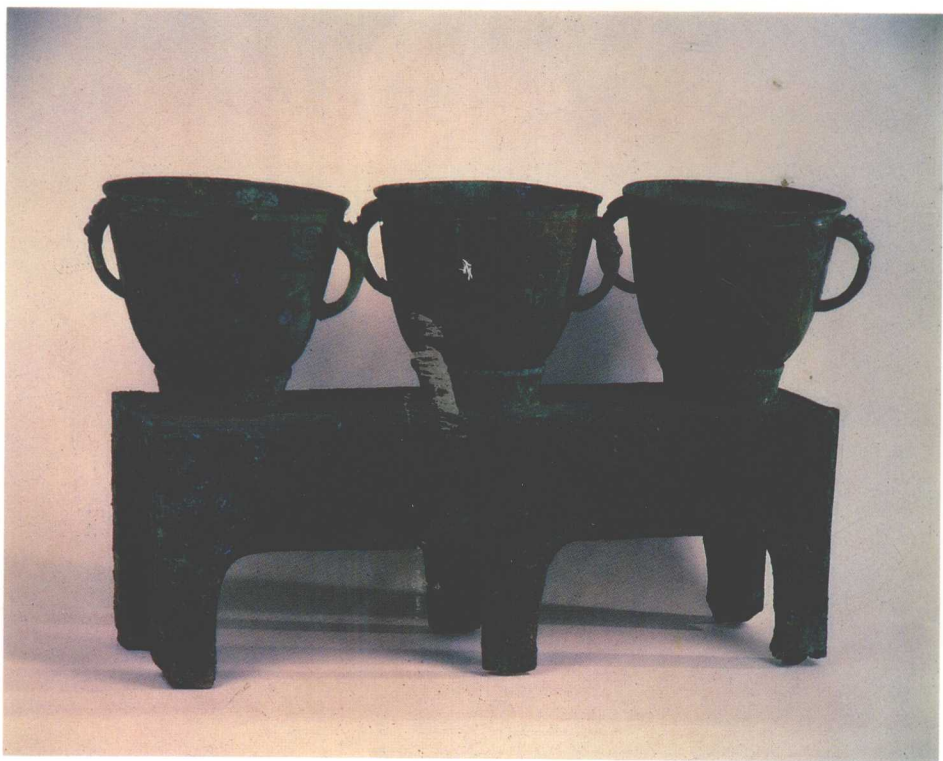


商·妇好墓出土铜圆鼎

①河南安阳西北郊洹河两岸，曾是商代的国都。据记载，自从盘庚迁都于此，共经 8 代 12 王、前后 273 年，商代的都城一直在这里。商亡后，商邑逐渐荒废，遂被称为“殷墟”。

②商代是我国古代青铜手工业的繁荣

时期，铜器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多，其铸造工艺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商代铜器按用途分有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而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物是鼎。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后母戊大方鼎，高 1.33 米，重 832.84 公



商·妇好墓出土铜三联甗



安阳殷墟杀人祭祀坑人骨

斤,腹内壁一侧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是商王文丁(或武丁)为祭祀其母“母戊”而作。它的造型庞大,铸法先进,为世界青铜文化中所罕见。

③商代大墓中有为奉侍墓主而从死的人,被称为“殉人”,如安阳武官村大墓共有

殉人45个。他们可能是墓主的近亲、近臣和近侍,其中有贵族也有家内奴隶。此外商代还有杀人祭祀和杀人随葬的,被杀的人被称为人牲,其中大多数为战争中掠夺的异族俘虏。